

石介蔣的 著論學史方西

美國芝加哥大學
教授 艾愷 著



本書係對西方現代中國歷史有關蔣介石的評價和分析，作「整體性」的敘述和批評，而不是以個人為對象。也就是對有關現代中國歷史的學術和通俗文學所涉及的共同問題、邏輯、假設、研析以及結論，作整體性的認定和分析，乃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學術性著作，值得向讀者們推薦此書。

西方史學論著中的 蔣介石

美國芝加哥大學副教授 — 艾 愷 著

目 錄

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	1
一、蔣介石性格的一般評估	4
二、無法建立一個有強大中央政府的統一中國	17
三、羣衆組織、運動及農村問題	38
四、失去大陸的近因	52
五、在西方史學論著中造成對蔣介石不良形象的原因	61
參考書目	104
 CHIANG KAI - SHEK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115

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

美國芝加哥大學副教授 艾 愷

受人讚美，也遭人指摘，蔣介石是二十世紀最受爭論的人物之一。基於我在本論文中所擬討論的各種理由，以蔣介石為中心的爭論，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愈來愈多。

由於蔣介石曾經陷於美國內部政治辯論和鬥爭之中，他乃成為幾度激烈爭辯的一部分，雖然這些爭辯與他無關，也不涉及他作為一位歷史腳色的全盤評價。最近的政治激情更使有關他的歷史作品作出了歪曲的判斷。甚至在西方純學術性的歷史著作中，他已變成一位「是」或「非」的人物，很少有持平之論。他在一國學者中所普遍引起的情緒，使得客觀性的歷史評估至為困難。雖然如此，對任何熟悉現代中國史學的西方人士來說，更為明顯的是，蔣介石的主要形象被認為是負面性的，而且是「失敗」的歷史人物之一。

筆者認為當蔣介石百年誕辰的今天，乃是對他在西方史學中的地位，作通盤檢討和評判的最適當時機。為了正確地觀察此一問題，我曾廣泛地重新檢討許多有關中國歷史的西方作品，所獲得的結論是：蔣介石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看起來，所有學術性專門著作、教科書和通俗歷史的作者，均對他有情緒化的偏見。本論文將描述和分析這種共同的論調，並說明歷史學家和新聞記者在論及「誰失去中國」的問題時，如何地不

明就裏，以及在這個討論的體系中，這些作品含有若干邏輯的矛盾和理論的不一致。最後，本論文將分析對蔣介石的否定傾向和史學中所發生的矛盾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同時亦提供一種改正他們錯誤的方法。爲求揭發史學中此種一面倒之謬見，另一方也犯錯誤，原是自然趨勢。有時候，此種討論可能被讀者誤解在爲蔣介石辯護，但真正意圖是在運用對話的第一步，以期最後獲致蔣介石歷史評估的平衡。

用於撰寫本論文的著作，自然不是「包羅萬象」，同時亦不作此圖。至少還有其他一百種學術專門著作及論文，評估或分析蔣介石的事蹟。我所選擇的是幾方面的代表作。第一、它們的出版跨越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六年的漫長期間；第二、它們涵蓋不同程度的嚴謹立場和在學術上的卓越性與重要性。筆者所選擇的包括非學術性的通俗歷史（一般來說出於新聞記者之手筆，而非歷史學家的著作）和教科書，以及現代中國歷史學者撰擬的非常專門的著作。在選擇作品時，筆者著重於編纂現代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取材態度，因爲它們通常對於尚在學生時代的未來歷史學家，以及撰寫通俗歷史的新聞記者具有莫大的影響。誠然，新聞記者在撰寫著作及論文中的歷史部分時，通常祇是改寫現有的教科書而使其更爲生動。我所謂「西方」的中國歷史學家的定義，也包括在西方撰寫和出版著作的原籍中國人，至於在中國撰擬西方語文著作的中國作者則不包括在內。（注1）凡非屬此類的一切著作的英文版本（如果有的話）均予採用。

一篇簡短的論文，因限於篇幅，不可能對這些著作所提出的各種論點，詳加說明。我將擷取各種歷史論著的主要論點和

共同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單元。我將討論各別的不同看法，至某種程度，但不擬探究每位作者及其著作的底蘊。因此，本論文係對西方現代中國歷史有關蔣介石的評價和分析，作「整體性」的敘述和批評，而不是以個人為對象。也就是對有關現代中國歷史的學術與通俗文學所涉及的共同問題、邏輯、假設、研析以及結論，作整體性的認定和分析，而不是批評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學者個人。

一個單一的問題支配著所有對蔣介石的歷史詮釋與評價：此即中國大陸陷入中共之手的問題。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後有關蔣介石的歷史分析，雖然通常是暗示的而不是明白的說明，但是每一句話都針對這個問題。歷史學家曾經界定數十種相互關聯的個別問題來評論蔣介石，在表面上這些問題均與中國內戰的結局沒有多大關係，但實質上是有意以此作為對內戰結局的詮釋。例如蔣介石的「儒家主義」似乎與失去中國大陸沒有關連；然而，這個問題被提到的唯一理由，便是因為歷史學家（通常下意識地）認為它是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的偶然因素。為了行文方便起見，我把這些複雜和相關的方面分為四類：

第一、討論蔣介石個人素養——人格、性格、智慧、氣質和意識型態的認同。

第二、這一類最為廣泛，也最為複雜，乃是蔣介石在現代中央集權體制下統一中國的成敗。

第三，蔣介石未能開展群眾組織、群眾運動和土地改革的問題。與土地改革失敗相關聯的是他未能縮小中國物質和文化的——「鄉村與城市」的鴻溝。

第四、討論中國內戰失敗的「近因」。

最後一節討論在西方史學論著中造成對蔣介石不良形象的各種原因。

一、蔣介石性格的一般評估

西方歷史學家如何在最普通的水平上把蔣介石歸屬於那一類人物？總括的說，即使是對蔣介石作出強烈否定解釋的那些人，都描繪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所以，視他為愛國者，可說是一般肯定的解釋。當然，在對日戰爭期間，西方作品經常熱誠地強調這一點。「他從沒有背棄他自己的崇高原則及其重建強大中國的信心。」（注2）

經常被認為對蔣介石發表不利言論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其最著名的著作中，稱蔣介石「苦心孤詣致力於中國民族主義」。（注3）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夫人的名著「史迪威傳」，雖然刻意批評蔣介石，但卻無意中留下一種印象，即蔣介石與史迪威的衝突之一是蔣介石的愛國主義。（注4）鄒儻（Tang Tsou）稱他為一位「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注5）梅斯基爾（John Meskill）的教科書稱他是一位「愛國者」。（注6）

甚至對蔣介石詆譏最強烈的克拉布（O. Edmund Clubb）亦不得不承認蔣介石是位「深具民族主義情操」的人物，並說蔣介石「確曾努力要求列強放棄它們在不平等條約下所擁有的特權」。（注7）蔣介石亦被普遍地認為是一位強烈的反帝國主義者。（注8）

批評的焦點在於南京十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間，蔣介石對日本侵略所表現的反帝國主義和愛國主義，似有

未當。批評的要義是認為他犯了一個錯誤——爲了消滅共黨份子，而遷延對抗日本的侵略。克拉布甚至把失去中國大陸，幾乎全部歸咎於這個政策：

「一九三一年日本對中國領土發動全面性的攻擊，當時中國國策的嚴重二分法變得非常明顯，它源於一個重要問題：中國應該採取新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動員全國力量以對抗日本侵略呢？或者應該姑息外國侵略者，俾便國民黨繼續致力於以武力抑制正在興起中的國內反對派呢？

蔣事實上早已有了抉擇。對他來說，注意國內的敵人，需要優先……蔣未能瞭解——或者不敢作此冒險——對日戰爭將會鞏固其統治權的有利效果。很明顯的，他也沒有估計到：如果他不利用不安的力量，敵對的政治集團就可能這樣做。因此，他作了抉擇：『先安內後攘外』。」（注9）

當然，克拉布的敘述是偏頗的，而且犯了嚴重錯誤。蔣介石認定對日戰爭的結果會使力量依然脆弱的國家，陷於毀滅，並使謀求統一和建設的所有努力，趨於中止。這是完全正確的。（注10）這也正是日本發動全面戰爭時所發生的事實。

有些學者甚至對蔣介石在更早的期間即已決定「先安內」的看法，作廣泛的延伸，他們辯稱：當他於一九二七年四月轉而對付共黨的時候，早已失去了原先反帝國主義的目的。（注11）但其他學者描述一九二七年以後蔣介石的政策，是「尋求以積極的政治民族主義與適應外國經濟利益的現實主義路線相結合。」換句話說，「蔣的明白意圖，是在避免與既得利益的英國、美國、日本和其他列強發生嚴重歧見。」（注12）然而，此種現實主義的慎重外交政策，卻被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批評爲「不

得人心」，因為當時的民族主義言論多主張及早對日本實行報復，並單方面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注 13）爲了某種理由，歷史學家很少認識到：蔣介石果真採取一種「深得人心」的政策，也可能會觸怒那些反對日本的中國的潛在盟友。

（一）個性

大多數人認爲蔣介石「律己甚嚴」和「生活節儉」。（注 14）蔣介石經常被描述爲具有「朝代建立者的一切特性和一切力量」。（注 15）大多數外國學者注意到蔣介石最顯著的個人特性是無情的「鋼鐵般的決心」、「不屈不撓的精神」（注 16）等等。當然，堅如鋼鐵的意志是一種良好的素養，但正是這種同一的素養（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至少是蔣介石成功部份原因），在用於分析他的失敗的時候，却被形容爲「頑固」，（注 17）這是主要矛盾的例證，在大多數對蔣介石作歷史分析和批評的作品中，屢見不鮮。同樣的素養、態度和行動，有些歷史學家認爲是他成功的因素，有的則認爲是他失敗的原因。另一個矛盾的例證是，一方面承認蔣介石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是一位機警和富有處世才能的政治能手，而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責他對每一個人都抱懷疑的態度。（注 18）

關於蔣介石在性格形成中所受的各種影響——智力及情緒方面，西方歷史學家有一種類似一致的看法。他們相信除「儒家思想」（通常沒有明確的界說）（注 19）之外，「軍事組織精神」和「武士道」是蔣介石性格的基本因素：

「出身清寒的書香家庭，具有鮮活的儒家傳統，而此

種傳統又因他的教育和日本軍事學校的訓練而更為加強，……因此人們可以斷言，……他代表了更多的軍事組織的精神和更多的秩序原則——如果你要說是武士道也可以。」（注 20）

湯遜 (James C. Thomson) 敘述蔣介石的青年時代說：「對於這位年輕中國軍官來說，武士道的概念具有深長的意義。」（注 21）

蔣介石在歷史上被目為「無情」，大部份源於一九二七年春的清黨，這在伊薩克 (Horold Isaacs) 所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有著典型的描述。伊薩克對蔣介石有聲有色的描繪，似乎對一九三八年以後三個世代的歷史學家，具有深遠的影響。例如，伊薩克曾經使用「背叛」（對革命而言）的暗喻，其後的歷史學家也依樣畫葫蘆。（注 22）又如「血腥迫害」、「恐怖統治」和「集體屠殺」等字句也經常出現。（注 23）（伊薩克何以有此影響的問題，詳見本論文第五節。）

（二）階級根源與角色

伊薩克所著「中國革命的悲劇」對蔣介石另一個人特性所發生的影響是：提出了蔣介石究在為那個經濟——社會階級「服務」的問題。伊薩克機械式地把歷史唯物主義適用於蔣介石，視他為資產階級的工具：「蔣所做的工作是保護資產階級——銀行家和商人——的利益。」（注 24）「蔣是那些出身於領導階級的歷史人物之一，因為他們的個人抱負，背景和歷史適於在某一特定時期為他們的階級需要而服務。」（注 25）伊薩克更以卑劣的暗喻指出：「蔣維護他的階級的利益，正如三

頭冥門狗守住冥門。」（注 26）自然，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郭恒鈺等也群起效尤，跟著稱蔣介石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化身」。（注 27）其後的許多歷史學家也假定蔣介石即使不是資產階級的工具，至少也是它的盟友，尤其在上海，都把此種解釋視為當然。（注 28）直到四、五年前，人們對此問題的研究比較深入，並提出了蔣介石及其黨其否真以階級為基礎的問題。（注 29）

在對此一持久不衰的普遍假設——亦即蔣介石多少在為資產階級或地主的利益而工作的假設，提出質疑的第一批學者中，有一位學者就是易勞逸（Lloyd E. Eastman），他在兩本著作中辯稱，不僅資產階級或地主沒有控制國民黨或蔣介石，而且蔣介石的政府根本就沒有階級的基礎，同時在國民黨政府與地主或資產階級之間，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注 30）其他學者亦指出蔣先生對資本主義懷有敵意：

「國民黨政府仍為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所支配，此種意識型態係源於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並因世界危機的經驗而加強。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國民黨重申它對私有資本主義的譴責。此種譴責在蔣影響下，三〇年以後更為強烈。」（注 31）

從此以後，其他史學研究者，也在本質上趨向於支持易勞逸的觀點，但因有的研究者提出他們自己的模式，以取代原有來自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致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注 32）

（三）法西斯主義者

歷史作者是用有什麼「主義」來形容蔣介石呢？西方歷史學家又認為蔣介石的思想包涵些什麼呢？探索某種主義的「主義者」，原是歷史學家喜歡玩的一種遊戲。由於他們所用源自西方經驗的「主義」詞句，具有西方的內涵，所以他們永不能抓住所欲描述的中國實際人物的現實。因此，「主義」的問題，導致無窮歲月的討論而不能獲得最後的解決。（注 33）

多年來一直爭論的「主義」詞句是法西斯主義。易勞逸試圖說明，蔣介石如果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則或許易被理解為「可能的法西斯主義者」。他的結論說，最低限度藍衣社曾被指為法西斯主義份子，而蔣介石本人則對「法西斯主義的事象頗感興趣」，同時也是「法西斯主義的熱情仰慕者」。（對此，人們應該注意到：在一九二〇及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大多數歐美出版品，包括許多著名的「自由份子」均是墨索里尼的「熱情仰慕者」。）易勞逸甚至進一步提示，蔣介石曾經捲入一項為了「法西斯主義」意識型態而放棄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陰謀。（注 34）

大約在易勞逸的同時，田弘茂（Hung-mao Tien）發表一篇有關藍衣社和CC派的論文，亦持相同的主張：「指導藍衣社的意識型態的原則，與一九三〇年代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極為相似」，而「藍衣社和CC派的活動，很明顯地反映出一種意圖，想把國民黨轉變為法西斯主義性質的黨。」（注 35）因此，「就基本導向和政治口味而言，蔣和『CC派及藍衣社』有甚多相同之處。」這就明顯地暗示蔣介石也可能是法西斯主義者。（以易勞逸和田弘茂的標準來看，毛澤東不僅是可能的法西斯主義者，而且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

當然，早在易勞逸之前，西方人即已企圖把「可能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帽子扣在蔣介石的頭上。到了一九三八年就有人把蔣介石重振國民黨革命精神的努力，與德國法西斯主義連結在一起。（注 36）西方中傷蔣介石最早而最具影響力的誹謗之語見於畢克（Grahman Peck）所著的「兩種不同的時代」（Two Kinds of Time）（在對日戰爭期間撰寫的），它說：

在一個較不落後的國家，由一個派系控制的一黨『訓政時期』，在一人統治之下，可能發生一種像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結果。國民黨統治的許多措施——領袖崇拜、軍隊精英、政治警察——都是追隨法西斯主義的模式，因而使人懷疑在精神上國民黨已是法西斯主義者，在結構上則想成為法西斯主義者。但在中國，法西斯主義現代國家的基礎尚不存在。」（注 37）

抗戰期間在華的一位新聞記者亦作相同的分析。（注 38）其後此種概念未再出現，一直到易勞逸和田弘茂於一九七二年再度舊事重提。（注 39）雖然約瑟夫·傅史密斯（Joseph Fewsmith）所著「極權結合政權」模式可能被解釋為對易勞逸論點的支持，但是西方的中國學者對它的一般反應，較少支持的意味。（注 40）分析問題中肯而精細的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不同意易勞逸和田弘茂（雖然不是直接的）的論點，他的結論：「蔣介石在他向國外尋求政治導向的時候，也承認這些因素最後必須來自一個國家的內部。」（注 41）此外，齊錫生（Hsi-sheng Ch'i）曾對此問題作慎審的分析，其看法亦是如此。（注 42）

然而，易勞逸和田弘茂有他們的影響力量。「『在蔣影響

下的國民黨』的官方教條，是因加入了儒家的訓誨和法西斯主義的格言而發展出來的」這句話，見於「劍橋中國歷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注 43) 幾部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一部今年出版)的作者，似乎也抱持易勞逸和田弘茂的概念：「他(蔣)也受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他在軍隊中聘用若干德國顧問和接受某些法西斯主義的理想；……他的藍衣社與意大利黑衣黨以及德國的棕衣黨相似。」(注 44) 被廣泛採用的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的教科書說：「蔣亦強烈地傾向於法西斯主義。藍衣社被灌輸法西斯主義的理論，由於蔣與藍衣社密切關係，所以他的法西斯主義思想至為明顯。」(注 45)

(四)儒教徒

幾乎所有西方歷史學家都稱蔣介石為儒教徒，其性格是因儒教影響而形成的。一般而論，在英文中「儒教」(Confucianism) 是指傳統的中國文化。因此，西方人的這些稱謂，等於是非西方人稱某一歐洲歷史人物的思想是受希臘羅馬和猶太基督的傳統所形成。

費正清所作有關現代中國歷史的各種說法，向為文化延續的觀念所支配，自然會把蔣介石評估為另一個朝代的創建者，但認為他未能成功地執行歷史任務，所以被一位更「進步的」朝代創建者所取代。費正清的一般理論，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受到了中國過去的影響，老的形態自動重演。以長遠的歷史來看，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以及他們的組織、信徒和

他們所建的國家)，在根本上是相似的。因此，費正清說：

「在一九一一年以後的空檔期間，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均盡力為統一中國而努力，中國共產黨以前的國民黨曾設法以新的政治意識訓練新型態的學者官僚，以求恢復曾一度由儒教士大夫和典型學者所行使的功能。

蔣委員長設法以他個人的正直以及較大的軍力和較明智的政治手段去壓制軍閥，正如舊時代的帝王，他到各省作廣泛的巡視和歷代漢王朝帝王的陵墓舉行祭典，……起初他以軍事征服敵人而統治，一九三〇年代他羅致學者進入行政部門，他自己則樹立了國家元首的道德典範。他的力量寓於這些傳統的品格：勇敢、維持權力的決心、對倫理的熱愛、為他贏得個人威望的自律、對其效忠部屬的忠誠，以及制衡反對勢力的嚴厲與靈巧。他完全依照這種古老的方式，進於聖人的地位。這種轉變使他在一九四三年乃能從過去的束縛中脫穎而出成為英雄，再出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並出版『中國之命運』作為教科書。」（注 46）

雖然這是片斷的摘錄——在幾頁以後，費正清自己否定了其他學者從他的觀念中引伸出來的簡單解釋（注 47）——但本段有幾點適足以說明大部份西方歷史評價的不合邏輯，且含有敵意。

費正清顯然認為毛澤東亦如蔣介石，都是中國過去的產物，祇是蔣介石乃「過去的俘虜」，而毛澤東似乎已擺脫了過去的束縛，他也認為毛澤東比蔣介石更為「前進」。然而，過去幾十年的事實已證明這種判斷是錯誤的，甚至在鄧小平的「後趨的革命」之前，祇要把蔣介石在臺灣的作為和毛澤東在大陸

的作法相比較，便可明白此點。不管用何種標準來衡量，大陸是較不「前進的」。

在西方歷史學家有關蔣介石所信儒教敘述中，同樣的敵意也很明顯。他們經常把儒教解釋為一種有限制或是弱點。蔣介石致力於曾國藩思想的研究，也被用來證明蔣介石的儒教是「不合時宜的」、「食古不化的」和「沒有效率的」。（注 48）

他們在評論新生活運動和「中國之命運」時，經常以否定態度去看蔣介石的儒教。他們都非議新生活運動的儒家思想，不是加以諷刺就是公然蔑視。他們說這一運動的儒教基礎「沒有豐富的哲學內涵」，它的價值是「口號化的」和「模糊的」，同時它是「家長政治的措施」，導致錯誤和決定性的失敗。它也「證明蔣祇是一個老式的儒教徒」。（注 49）在對「中國之命運」的分析中，同樣的蔑視態度也是很明顯的。與毛澤東自己反帝國主義和反西方的作品比較起來，蔣介石的「傳統主義甚至引用了更為過時的觀念。在青年學生群衆中，它（指中國之命運）是一個可憐的競爭者。」（注 50）它的「反帝國主義染有盲目愛國主義的色彩」。（注 51）它的民族主義是「保守的」和「仇外的」。（注 52）

關於意識型態的另一種經常辯論的課題，是蔣介石的儒教，在內涵和外表上，都不足以吸引青年。他的「和諧社會秩序的儒教理想，……不能提供現代中國青年所追求的『全盤』意識型態的取向。」（注 53）「它在青年學生中處於惡劣的競爭地位」，（注 54）同時「顯露出理想的保守性貧乏」，（注 55）以蔣介石為儒教徒所作的分析，同樣的在許多方面認為他是「傳統主義者」或「保守派」。（注 56）